

廖季立经济文集

经济科学出版社

廖季立经济文集

经济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2 号

责任编辑:赵瀛 吕亚亮

责任校对:白惠荣

封面设计:卜建晨

廖季立经济文集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兆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25 印张 265000 字

1994 年 11 月第一版 199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7-5058-0764-1/F·600 定价:14.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廖季立经济文集/廖季立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ISBN 7-5058-0764-1

I. 廖… I. 廖… III. 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文集 IV. F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470 号

廖季立同志生平

廖季立同志生于1915年1月8日，江西省吉水县人。1936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革命，1937年底到达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1938年6月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调到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从此一直从事经济工作。

廖季立同志在延安工作期间，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他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科长，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秘书主任时，因工作出色，曾获嘉奖。

廖季立同志1949年进京后，随陈云同志从事组建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任秘书处处长兼财政金融贸易处处长。后历任国家统计局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副局长、局长、专职委员、秘书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恢复工作后，历任国家计委局长、委员，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顾问，国务院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廖季立同志忠诚党的事业，勤奋工作，善于思考，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建国后，他长期在国家计委和经委担负重要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领导年度计划的综合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更为可贵的是，他能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针对当时经济决策中的“左”倾错误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大跃进”期间，他就曾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错误提出过意见，并因此受到不应有的批

判和对待。粉碎“四人帮”后,他恢复工作,满腔热情重新投身到经济计划工作中,以其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敏锐的目光,对合理安排经济发展速度、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关系和农轻重之间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为调整好国民经济和医治好十年动乱创伤竭尽自己的力量,并为此曾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廖季立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竭诚拥护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党的十四大决议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他积极参与、勇敢探索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卓有建树。早在1978年下半年开始酝酿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他从多年的亲身实践经验中,深刻认识到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勇敢冲破某些传统理论和计划经济僵化思想的束缚,勇敢探索改革的路子。他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一项伟大的科学探索,是一种开创性的事业,历史上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他还提出:改革的中心问题是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完全的核算单位,实行自负盈亏的制度”。他以探索者的勇气,在1979年初关于商品经济问题的争论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我们的计划经济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经济管理也必须由行政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他在1980年提出应从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谈体制改革,从新的角度论证了改革思想,受到当时中央有关领导的表扬。他在1982年提出用系统论的观点研究建立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他还在1986年就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命题。他赞同和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并提出不仅要实行政企分开,还要实行政经分开。他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主持和参与了改革规划、试点、协调等工作,起草了许多重要改革文件。他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即使在积劳成疾、住院治疗期间,仍不忘改革大业,多次写信给中央领导陈述己见。到体改研究会工作后,

仍继续潜心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设想与重要操作问题，在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论述，并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对比研究，以及在调研我国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平衡调控等改革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有创建性的意见和系统的研究报告。1985年以来，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论述》、《论计划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平衡调控》4部专著。他直到发病前一天，还在撰写改革文章，为改革事业倾注了最后的心血。

廖季立同志为人正直，艰苦朴素，廉洁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善于学习。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属也要求严格，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

1993年12月14日，廖季立同志突发心肌梗塞，因抢救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50多年来，廖季立同志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财经战线忠诚的老战士，使我们的改革大业失去了一位有谋略的勇敢探索者。

编者的话

1993年12月14日,廖季立同志因突发心肌梗塞溘然去世。这位在党的财经战线奋斗了半个世纪的老人,就在发病前一天,还在撰写关于经济改革的文章。文稿寄出后,他的心情很高兴,可是万没想到,第二天就病倒了。多年来,他把自己的心血全部浇灌在改革事业上。读者从他已经出版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论述》两本论文集中,可以看到一位改革的勇敢探索者和辛勤耕耘者的足迹。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作者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属,收集了他的遗稿编撰而成。其中绝大部分文章是前两本著作未选入的,还有一部分文章是1978年以前的。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只作了个别的文字处理,保留了文章原貌,以便读者了解作者的思想发展过程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力图反映作者经济思想概貌,故此书名为《廖季立经济文集》。

本书作者自1940年在延安调到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到他去世前,一直从事经济工作。在延安时期,他曾为毛泽东同志起草《新民主主义论》,搜集过有关经济部分的背景材料。针对当时所谓“法币腿长、边币腿短”的问题,曾提出如何使法币和边币等量流通的主张;同时还发表过如何反对日寇“三光”政策的文章。1948年,他被西北局选派到西柏坡中央财经部,后跟随陈云同志到北京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他又随薛暮桥同志组建国家统计局。

在1954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作者一直在国家计委担负重要工作,这是他经济方面的才能得以显露和发挥的时期。在第一个五

年计划期间,他在国家计委具体领导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取得过显著成绩。当时,我国的计划制度主要是照搬苏联的模式。在实践中,他深感我们的国情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积极主张学习苏联的模式要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多次提出国民经济发展要农、轻、重并举,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工业发展要大中小企业相结合,土洋并举,走中国式的工业发展之路。他认为,在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中,真正经过认真计算的品种,不过 1/10 左右,如果盲目扩大范围,势必脱离实际。在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年代,他发现各地上报的数字与实际出入很大,便力主压缩钢的生产指标,为此,在所谓“反右倾”风中,他曾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和批判。在本书的两篇回忆录里,读者可以详细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

在 60 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时期,作者继续具体主持年度综合计划工作。在回顾这一段工作时,他认为,所谓调整,最重要的是解决好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问题。主要方法就是在计划安排中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在当时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下,计划留有余地,实质上就是缩小了计划内的比重,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从而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这种作法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当时,毛泽东同志曾在一次批示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者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个思想。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计划方法,而是一个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作者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就不断撰写文章,阐发自己的经济思想。比较重要的有《论甲乙两大部类生产的关系》、《谈综合平衡》、《论大中小企业相结合》、《论计划管理制度问题》、《谈谈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遗憾的是,由于搜集上的困难,在本次编书时我们只找到几篇,远不能反映作者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作者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似乎焕发了第二次青春。他

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衷心拥护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由于他在国家计委工作了二十多年,对计划经济的利弊得失有深切的感受。面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几起几落,使他常常陷入苦苦思索之中。所以,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的时候,他就积极投入改革时代的大潮。无论是在最初成立的体制改革办公室,还是在后来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乃至退居二线后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他都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竭尽全力为改革献计献策。这一段,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思维最敏捷,写的文章最多的时期。

作为国家体改委的领导之一,他主持过总体规划工作,最早参与城市综合试点,负责过重大改革课题的研究,起草过一些有份量的改革方案和调查报告。作为一名学者(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和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专家,他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改革的方向,提出过不少有独创见解的思想,读者从这本书和他的其他著作中完全可以领略到。为阅读方便,这里,我们试图对作者1978年以来经济思想的脉络,作以下简要概述。

一、关于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

这个问题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早在改革初期,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作者是较早宣传和主张建立商品经济模式者之一。1979年初,他就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要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1980年,由他主持召集国内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的同志,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讨论,起草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按照这个思想,当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总的设想要点是:

1. 把企业从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

2. 把受行政系统分割的封闭的产品分配调拨体系,改为统一领导的开放的商品市场。

3. 把主要依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改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

4. 把党政直接管理经济,改为主要通过经济机构管理经济。

5. 把忽视法治、改为严格法纪,加强经济立法、司法和监督。

这是最早提出的较为系统的改革总体设想,其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这个文件是集体的智慧,但是作者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他会有此真知灼见,主要来自对传统体制弊端的深刻体会与认识。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有大量这方面的具体论述。

二、关于建立我国经济管理的四大体系

在研究经济体制总体规划中,作者深感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作,必须配套地进行。1982年,他发表了《建立新的经济管理体系》一文,提出我国经济管理应当建立起四大体系,即经济组织体系、经济管理体系、经济调节体系、经济监督体系,并对每一体系都进行了具体描述。在改革初期,一般都认为,“破”是主要任务,对应“立”什么新体制还不明晰。作者关于建立国民经济四大管理体系的论述,较早地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设想。在退居二线以后,他进一步集中精力,选择宏观调控体制框架作为研究课题,这也是他长期在计委工作时就已萌发的愿望。他组织了一些同志,经过潜心研究,在1993年上半年,终于完成了“宏观调控体制框架”这一重大研究课题。对这个框架意见,他并不满足,他本想搞得更为详尽些。但对于年事已高的他,这已经是太繁重了。

三、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全面展开,作者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见解。他认为:经济管理“条条、块块”不是分割,而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结合点在哪里?不在部门,也不在地区,而是在城市,这是由城市的经济特性决定的。城市不是封建性质的“庄园”,它的本质是开放的。作为一个城市,只有不断地和外界进行人才、商品、货币、信息等诸方面的交换,才能充满活力。交换的规模越大,活力也就越强。他还提出,强调重视城市的作用,并不是要把原来部门、地区的管理权限和管理办法原封不动地移交给城市,而必须跳出老框框,走一条按照经济的内在联系,以经济办法为主管理经济的新路子。概言之,城市的功能主要是“规划、指导、协调、服务、监督”10个字,而不是具体干预企业的产供销和人财物活动。他还在多篇文章中阐述,随着城市功能的扩展,会形成中心城市群,进而演化为各具特色的经济区。诸多经济区的形成,将促进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巨大的变化。

四、关于“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

1986年,作者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论述计划体制改革的文章时,就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观点。1987年6月,在起草党的十三大文件时,他还在养病。当国家体改委的领导征求意见时,他又重申了这个问题。直到1988年下半年,身体状况好转后,他又深入进行研究,提出了系统看法。他认为,这个运行机制是开放竞争型的,其主体是企业,基础是市场,领导是国家。三者互相联系,互相推动,互相配合。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计划决策、经济政策、经济调节手段以及相关的监督系统。市场引导机制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包括联系、交换、协作的作用,推动、竞争、开发的作用,调节、选择、配置的作用,评价、制

约、淘汰的作用,信息、交流、依据的作用等。其组织形式也是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等。企业的运行机制,既包括多种所有制形式,也包括多种经营方式和协调组织等。对如何顺利实现新旧运行机制的转换,而不致出现大的失误,作者提出了四个需要注意的关键点:(1)实现宏观总量基本平衡;(2)转换行政机关职能;(3)市场竞争调节;(4)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经营的主体。

五、关于稳定、改革、发展的关系

在1985年以来3年多中,作者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近20封信,表述自己对改革和发展问题见解。1988年5月,他以“谈谈经济稳定、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为题,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刊登在同年7月4日的《人民日报》。他提出,经济稳定、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对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大为有利。在这三者关系中,改革是统揽全局的,深化改革既可以从根本上促进稳定,也可以从长远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当然,改革要冒风险,有利时要抓住时机,不利时要择善而从,要以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为原则,坚持稳中求改,改中求发展。保证经济稳定、改革、发展之间的协调,不是消极、被动、保守的方针,而是积极、主动、明智的方针。如何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作者认为关键是要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保持基本平衡。为此,他通过认真总结国内外经验,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以上几点只是对作者思想的部分描述,难免以偏概全。十几年来,他努力把马列主义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改革实践结合起来。他提出的从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谈体制改革,把我国的重型生产结构调整轻型生产结构,以效益为中心安排比例和速度,社会主义与所有制问题等,也都有一定的新意。他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有很强的探索精神,这也是我们改革最需要的精神。因为,改革的本身实质就是一种探索,唯有探索才能找到

出路。

在作者 50 多年的经济工作生涯中,勤于思考、深入调研是他一贯的作风,正由于此,使他对经济工作有一种敏锐的“直感”和预见性。他视“实事求是”为座右铭,勇于坚持真理,和他接触过的同志,常常会为他的耿直、执着的人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我的爱好,除了经济工作,就是书法。”经济工作似乎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经世济品,魂之所系!作者的书法有很深的造诣,我们相信,他的经济文章也会给后人留下有益的启迪。

勤於思考 勇於探索
為廖季立經濟文集題

薄一波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新秋
佳日
賦詩
高
多

壬申年
序年主

